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zhou University*  
ISSN 1009-1734, CN 33-1018/G4

##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附近”视域下的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利用路径研究——以杭嘉湖地区为例  
作者：章萍芳  
网络首发日期：2025-12-09  
引用格式：章萍芳.“附近”视域下的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利用路径研究——以杭嘉湖地区为例[J/OL].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https://link.cnki.net/urlid/33.1018.G4.20251208.1647.002>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 “附近”视域下的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利用路径研究

## ——以杭嘉湖地区为例

章萍芳

(湖州师范学院 艺术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摘要：**在现代化和数字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根植于地方日常生活的“附近”日渐式微，这一现象不仅见于城市，亦蔓延至乡村社会。本文以项飙提出的“附近”理念为理论视角，选取浙江省杭嘉湖地区为案例，聚焦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的再利用路径。研究发现，当前已再利用的遗产空间普遍存在“形式化”“脱嵌化”与“去场所化”三重困境，从而未能回应遗产空间与在地村民之间的日常联系与情感需求。为此，从“附近”的空间性、情感性与社会性三个维度出发，重构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的再利用路径，旨在突破传统以“他者”为导向、忽视“我者”的利用范式，构建具备日常性场景的回归、情感黏性的分类建构与空间嵌入、经营过程中的角色重构与互惠机制的遗产利用路径，为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空间的可持续活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方向。

**关键词：**“附近”；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利用路径；杭嘉湖地区

近年来，社会的加速化、“地方”的空间化、公共生活的无聊化共同导致了人们感官体验的凋零与社会交往的萎缩<sup>[1]141-149</sup>。在城市中，这种变化具体表现为“附近”的消失——一个体虽身处同一物理空间，却鲜少发生深层互动；邻里关系由熟识转向疏离，公共空间逐渐演变为人们擦肩而过的通道型场所。这种原本被视为城市社会特有的现象，如今正悄然向乡村社会蔓延。

---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八八战略’指引下浙江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的传承与创新利用研究”（23LLXC040YB）；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课题“江南运河（浙江段）工业建筑遗产活态传承利用研究（Y202248414）；2023年度浙江省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校企合作助力浙江工业建筑遗产的文化传播与设计创新”。

作者简介：章萍芳，硕士，副教授，从事乡村空间设计、遗产创新设计研究。

随着乡村生产方式的持续演变与人口流动的不断加剧，乡村社会结构正经历深刻变迁。一方面，外出务工以及异地购房带来的人口流失，打破了村庄原有的相对静态格局，使乡村社会呈现出异质化与多元化特征；另一方面，基于地缘与血缘为基础构建的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也在人口的快速流动中逐渐松动乃至趋于解体。村民虽在地理空间上依然邻近，但彼此间的日常交往却日趋稀疏，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与互动频率持续降低。这种空间邻近与社会疏离之间的张力，使得部分乡村显现出“居而不社”“共居而不共处”的城市型社区特征。乡村社会正从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逐步转向半熟人化乃至陌生化的社会结构，地方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乡村共同体的基础亦随之弱化。随着社会关系的断裂与情感联结的削弱，那些曾因空间重叠与频繁互动而自然形成的“附近”逐渐消隐，乡村日常生活的社会黏性与人文温度也因此流失。

在乡村生产方式转型的背景下，作为曾经乡村日常场景重要承载体的各类工业建筑——它们大多形成于乡村工业化时期——正逐渐退出现实生活的核心场域。这些建筑原本深度嵌入乡村日常生产、生活与交往网络之中，既是特定历史阶段地方性经济活动的物质场所，也是“附近”关系得以生成的重要社会节点。在那里，工作、生活与交往彼此交织，构成了乡村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来源。然而，随着原有产业的衰退与功能的中止，这些工业建筑逐渐从乡村生活日常实践中脱离，成为形式上“存在”而功能上“空转”的边缘性空间。“附近”——作为日常互动场所的邻里和工作空间——逐渐消隐<sup>[2]78-98</sup>，这些空间与乡村居民之间的互动机制和情感联结也随之弱化。

在“附近”持续式微的社会语境下，重新审视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在盘活闲置空间背景下的再利用方式，显得尤为关键。然而，当前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的利用实践普遍呈现出“博物馆式”“展览馆式”等形式化、视觉化倾向，导致其作为“附近”的象征性“在场”而存在，却未能真正嵌入日常，成为承载生活关系的“场域”。原本应作为“附近”关系生

成重要社会节点的这些建筑，因功能异化而被固化为“远方”的展示对象，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乡村中“附近”的断裂与人际关系的疏离。这些空间当不再被持续的“附近”生活赋予意义时，便逐渐转化为难以进入、难以理解的“他者”空间，其本应承载的遗产价值也陷入一种“悬浮”状态。这一现象不仅折射出乡村空间社会性基础的松动，也揭示了当前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再利用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脱嵌化”利用困境。

本文以“附近”作为研究方法，聚焦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在当代乡村社会转型中的利用实践，探讨其如何通过空间重构、社区参与和关系再造，实现重新嵌入乡村社会，进而回应以下问题：我们究竟要找回“谁”的“附近”？应通过何种方式重建“附近”？如何在“我者”和“他者”的互动中共建“附近”？基于对杭嘉湖地区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及其利用现状的田野调研与归纳分析，本文力图在“附近”视域下，构建一种可与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利用实践展开可操作性对话的框架，从而为当前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的社会性重构与再生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 一、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一） 研究方法

#### 1. “附近”的概念及其作为方法论的意义

“附近”一词原指地理空间上离某地不远的地方，处于极近与极远之间<sup>[3]33-43</sup>。自学者项飙于2019年正式提出“附近”这一概念以来，该术语在社会学与人类学领域被赋予了超越地理尺度的理论深度与方法论意涵。项飙指出，“附近”是不同立场和背景的人们在生活中频繁相遇的生活空间，它能够持续增强人们认知多维世界的能力<sup>[4]147-165</sup>，其独特之处在于具有显著的社会性<sup>[5]1-9</sup>。在这一理论转向中，“附近”不再仅仅是对物理空间维度的界定，而逐渐演变为一种兼具分析视域<sup>[2]78-98</sup>与研究方法<sup>[1]141-149</sup>的学术工具。它并非描述“社会构造”的基本单位，而是人“构造社会”的工具<sup>[6]87-105</sup>。作为研究方法，“附近”强调个体在

情感和文化维度上对社会的粘黏性<sup>[1]141-149</sup>，兼具情感性、空间性、社会性三大属性，并倡导以“感官共鸣”和“关系互惠”为路径，恢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从而为恢复现实空间中共同体的重建创造条件<sup>[7]122-135</sup>。

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附近”的持续式微已成为广泛共识。项飙指出，越是现代化的社会，就越容易丢失“附近的生活”<sup>[8]57-59</sup>。个体在“时间的暴政”<sup>[5]1-9</sup>之下正日益失去“出门的动力”，表现为邻里关系式微、公共交往趋于最小化、交往关系日渐稀薄。在乡村社会中，这一转变尤为明显：一方面，作为本地遗产创造者、使用者和传承人的“我者”群体，因代际更替、外出务工、教育迁移等因素，逐渐与在地社会关系网络脱嵌；另一方面，由游客、运营主体、政府部门管理者、文化权威者等构成的“他者”群体不断进入并占据主导，乡村空间在资本与制度逻辑的驱动下被重新编码，这也进一步冲击了“附近”的生成基础。空间虽仍可见可用，但“附近”所依赖的社会性与情感性基础却随之解体。

“附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乡愁<sup>[6]87-105</sup>，其真正意义在于重构空间、社会与情感之间的联结机制。它既非对“我者”生活方式的封闭性维护，也非对“他者”乡村意象的顺从性迎合，而是一种能够连接“我者”与“他者”，并将生活空间与意象空间有效贯通、重新编制的方法工具。

“附近”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当前以标准化规划、视觉化更新和以流量为导向的乡村建设实践提出了有力质疑。近年来，艺术乡建等工程性操作模式虽表面上强化了乡村空间的可视性，却往往忽视其中的情感张力与社会关系网络，致使乡村逐渐从富有意义创造与体验的“地方”蜕变为空洞的“空间”<sup>[7]122-135</sup>。而“附近”方法的引入，则旨在强调回归真实生活脉络，以人地关系的重建为导向，从社会性、情感性与空间性三方面修复乡村空间的在地性与公共性。

## 2. “附近”的方法与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空间利用的对接

近年来，“附近”这一概念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城市语境下的应用，集中体现在城市社区治理<sup>[9]</sup>与数字化怀旧空间<sup>[10]42-48[11]55-66</sup>等领域。此外，还涉及社区空间营造<sup>[12]114-120[13]68-82</sup>、空间重建与文化生产<sup>[14]60-72</sup>、教育空间建构<sup>[15]49-57</sup>、城市邻里商铺<sup>[16]98-108</sup>、城市书房建设<sup>[17]136-147</sup>、城市消费空间生产<sup>[18]108-112</sup>，以及骑游者自我认同<sup>[19]59-73</sup>、微旅行体验<sup>[20]127-136</sup>等多个方面的“附近”建构实践。相较而言，乡村语境下的“附近”研究尚显薄弱。尽管已有研究开始关注其在农村养老服务<sup>[21]146-152</sup>与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sup>[22]115-128</sup>等方面的应用可能，但整体仍处于理论探索阶段，缺乏系统性的实证研究与深入探讨。总体来看，现有成果多停留在宏观层面的社会现象诊断，对“附近”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如何具体介入空间再利用、地方规划、公共空间营造等实践环节，尚未展开系统性探讨。因此，在“附近”概念与方法论基础逐步清晰的背景下，有必要将“附近”视为融合空间、社会、情感维度的研究取径，引入乡村具体空间类型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其在空间利用与社会重构过程中的方法价值与实践潜能。

乡村工业建筑遗产作为乡村社会与工业发展交汇的历史产物，承载着特定历史阶段下的生产记忆、集体劳动经验与社会交往结构，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内涵。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与乡村功能演变，这些曾兼具生产与生活双重功能的工业建筑逐渐退出使用场域，成为边缘化与闲置化的空间，日益远离乡村日常生活的核心轨迹。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如何合理再利用此类空间，已成为当前乡村空间重构与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重要议题。已有关于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利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作为记忆场所<sup>[23]16-18</sup>、空间—产业联动<sup>[24]63-66</sup>、周边资源整合<sup>[25]439-443</sup>、场地环境适宜性<sup>[26]83-88</sup>等方面，侧重于文化价值与经济功能的空间更新策略。在实践层面，相关改造多呈现为博物馆、展览馆、消费场所、公共服务中心<sup>[27]14-18[28]26-29</sup>、乡村文旅综合体<sup>[29]138-145</sup>等形式，体现出较强的展示性与

经济导向性。基于以上，可以发现：首先，现有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利用多采用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逻辑，强调空间激活、经济赋能与文化展示，却忽视了空间作为社会关系发生场域的基础属性，导致空间在形态上虽得以更新，却未能实现社会再嵌入；其次，多数利用策略主要面向“他者”群体的视觉体验与消费场景营造，未能回应“我者”的生活实践与情感结构，致使空间成为“远方的近景”，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生活的“附近”；最后，现有利用方式忽略了遗产空间与村民日常互动之间的微观联系与情感生成过程，未能有效重构“附近”所依赖的共处节奏与交往密度，进而导致公共性空间趋于空壳化与功能漂移。

因此，将“附近”作为研究方法引入对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的空间再利用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与实践指导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引入“附近”研究方法，在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利用研究中构建新的分析框架与实践视角，重新理解遗产空间如何从“可视化的存在”转变为“可共处的场所”，并进一步探讨其在构建地方认同、激活社会网络与维系情感联结中的现实作用。

## （二）研究框架

在当前“附近”日渐式微的社会背景下，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的再利用问题已不再局限于物理层面的修复与功能再生，更关乎其作为社会关系与情感联结网络的再激活。基于此，本文以“附近”为分析视角，构建涵盖空间性、情感性和社会性三重维度的研究框架，试图回应遗产空间如何从物理空间逐步转化为具有情感黏性、并最终实现社会关系共构的“附近”式发展路径。其中，空间性维度关注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空间作为物质载体的日常性回归，强调其形态适宜性与功能适配性在实际生活中的再接入；情感性维度聚焦个体与群体在遗产空间中的记忆投射与情感共鸣，重视空间与地方经验之间的情境再造与认同修复；社会性维度则强调空间中人际交往、社区互动与关系结构的重建，探讨其在“我者”与“他者”之间实现共处与协同的机制。该研究框架（见图 1）旨在通过三维属性的交叉分析，

推动“附近”方法由理论概念向实践工具的转化，为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再利用提供兼具情感共鸣性、社会嵌入性与可持续性的分析模型与规划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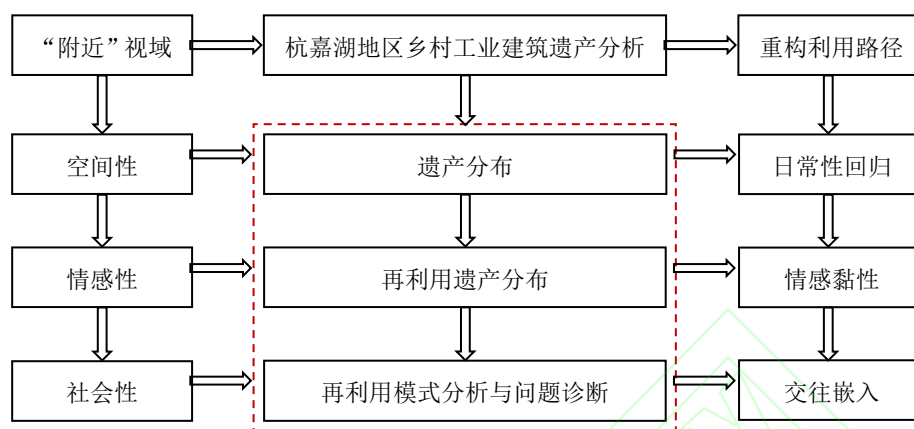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框架

## 二、杭嘉湖地区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的现状

### （一）数据收集

#### 1. 研究区域

杭嘉湖地区位于浙江省北部，地处长江三角洲东南缘，是江南大运河沿线的重要节点区域，涵盖杭州、嘉兴、湖州三市。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水网密布、经济富庶、文化积淀深厚，长期以来是江南农业文明与手工业文明并存发展的重要区域，孕育了蚕桑纺织、粮食加工、棉纺染织等为代表的乡村工业体系，在乡村工业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在浙江省域空间格局中，杭嘉湖地区历来是城镇化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活跃、社会转型程度领先的区域之一。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伴随乡村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在该区域的乡村中大量涌现出服务于农业加工与丝绸纺织的丝厂、茧站、粮仓、茶厂、榨油坊等工业建筑。这些建筑类型多样、分布广泛，深度嵌入乡村生产、生活与交往的社会网络之中，曾一度构成乡村经济与空间秩序的重要节点。随着乡村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功能更新的推进，此类乡村工业建筑逐渐退出原有的生产体系。经过时间的沉淀，部分建筑已演变为当代乡村空间中的工业建筑遗产。

选择杭嘉湖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三方面的重要动因与研究价值。一是先行性。杭嘉湖地区作为浙江省乃至全国乡村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其乡村空间形态、产业结构与社会组

织形式已进入转型深化阶段，为分析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利用与“附近”社会关系变化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典型场域。二是典型性。该区域遗存的乡村工业建筑遗产数量众多，建筑形制与空间布局具有浓厚的在地性特性，提供了扎实的实证基础。三是可操作性。该地区在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乡创融合等方面起步较早，大量乡创工业建筑遗产已被纳入再利用体系，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以及可量化、可视化的分析维度。

## 2. 数据界定、来源与筛选

为系统梳理并深入分析杭嘉湖地区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的数据特征，本文基于工业发展历史脉络及浙江省工业化实际进程，构建了一套时间与类型双重维度的统计框架。在时间维度上，依据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的重大历史节点与社会制度变迁，将样本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840—1911年、1912—1949年、1949—1976年。在类型维度上，结合杭嘉湖地区乡村工业发展的产业基础与地域分布特征，依据行业门类将遗产样本划分为缫丝与丝织、棉纺染织、食品加工、其他主要轻工业、重工业、市政工业、军事工业、工业相关八大类别。这一统计框架，有助于厘清杭嘉湖地区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的结构特征，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数据支撑与分析基础。

研究资料和数据来源有四。一是实地调研数据，通过对该地区的乡村开展的系统性田野调查，获取了大量具有空间定位性的一手资料。二是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线上资源及相关领域的论著。三是已发布的各类遗产名单，包括国家层面的《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以及浙江省和各市县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历史建筑名录等。四是地方志、行业志与地方档案等资料，包括在不同时期、由不同地区编纂的地方文献、行业文献与地方档案资料，其中部分内容涉及乡村工业发展的历史背景与建筑演变过程。

在资料采集与整合过程中，本研究对数据的真实性与时效性进行了多重筛选与甄别，

尤其关注因乡村行政变更所导致的地名更迭、遗产点名称混淆等情况，确保所收集资料与实际空间相对应。同时，结合地理信息辅助判断与实地核查，进一步确认所挖掘资料对应的对象是否仍处于现存状态且属于当前行政区划下的乡村地区范畴，以保障研究对象的准确性与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 （二）空间分布

### 1. 杭嘉湖地区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空间分布

在对杭嘉湖地区乡村工业建筑遗产信息进行系统梳理与归纳的基础上，共统计出 239 处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工业建筑遗产（见表 1）。其中，杭州 80 处，占总数的 33.47%；嘉兴 68 处，占总数的 28.45%；湖州 91 处，占总数的 38.08%。总体来看，湖州在数量上占有相对优势。三地遗产数量的差异性，不仅与各地乡村产业发展的历程密切相关，也受到地理区位、乡村发展进程及遗产保护意识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表 1 杭嘉湖地区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各类型数量统计表

地区	时间	类型							
		缫丝与 丝织	棉纺 染织	食品 加工	其他主要 轻工业	重工业	市政 工业	军事工 业	工业相关
杭州	1840—	1	1	2	1	1	0	0	2
	1912—	0	0	1	2	0	0	1	2
	1949—	11	1	7	3	6	5	11	22
嘉兴	1840—	2	0	1	1	1	0	0	2
	1912—	5	0	0	0	2	0	0	0
	1949—	29	0	0	5	2	0	0	18
湖州	1840—	5	1	2	0	0	0	0	3
	1912—	3	0	0	2	1	1	8	2
	1949—	28	0	2	4	9	3	0	17

### 2. 杭嘉湖地区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再利用空间分布

在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实践中，再利用已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策略路径，甚至被视为实现其可持续保护与价值转化的必要手段。本文基于前述数据与筛选方法，对杭嘉湖地

区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的再利用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与统计。结果显示，该地区已实现再利用的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共计 79 处（见表 2），占杭嘉湖地区遗产总数的 33.05%。其中，杭州 30 处，占再利用遗产总数的 37.97%；嘉兴 24 处，占 30.38%；湖州 25 处，占 31.65%。从再利用类型来看，工业相关类（34.18%）、缫丝与丝织类（24.05%）以及其他主要轻工业类（13.92%）占比较高，反映出以传统手工业形态为基础的再利用倾向。

表 2 杭嘉湖地区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再利用各类型数量统计表

地区	类 型							
	缫丝与丝织	棉纺染织	食品加工	其他主要轻工业	重工业	市政工业	军事工业	工业相关
杭州	3	0	4	4	2	1	7	9
嘉兴	9	0	1	4	1	0	0	9
湖州	7	0	1	3	3	2	0	9

杭嘉湖地区不仅拥有数量可观、类型多样的乡村工业建筑遗产，而且在三地乡村发展路径与政策推动的共同作用下，其遗产再利用亦表现出较高的响应程度，并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性。这一分布特征为从“附近”视角出发，探讨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如何实现社会性重嵌、情感黏性与空间转化，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 三、 现有遗产再利用的问题诊断

#### （一）再利用模式特征分析

通过对杭嘉湖地区遗产点的再利用模式进行归类整理，可大致分为十类。（1）陈列展示类（23 处，占比 29.1%）：包括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展陈室等，强调主题性文化展示功能，如新四军随军被服厂被再利用为新四军军史展览厅、党团宣誓室、被服厂旧址陈列室等。（2）公园景观类（6 处，占比 7.6%）：注重环境营造与风景塑造，如陈湾石矿旧址被改造为齐山植物公园。（3）乡村创业园或文化街区（14 处，占比 17.7%）：聚焦功能复合与经济转化，兼具文化与创意产业导入，如柳家村战备粮仓被改造为谷堆乡创基地。（4）图书馆类文化空间（6 处，占比 7.6%）：强化知识共享与公共文化建设，如海鸥电扇

厂原址被利用为梅里有为图书馆。(5) 酒店与餐饮类(4处, 占比 5.1%): 侧重商业运营与经济再生, 如生计米行被改造为沿河餐厅。(6) 研学基地类(3处, 占比 3.8%): 兼顾文化传播与经济收益, 服务于教育旅游等复合需求, 如龙泉茧站被改造为蚕桑文化主题研学基地。(7) 民宿类(3处, 占比 3.8%): 满足乡村旅游住宿需求, 如老虎潭粮库被改造为老虎潭山居民宿。(8) 简易出租类(13处, 占比 16.5%): 以低成本形式对外出租, 追求短期经济效益, 如红星机械厂被出租用于养鸡。(9) 保留原有功能类(5处, 占比 6.3%): 仍承担部分传统生产或存储功能, 体现功能延续性, 如菱湖丝厂部分建筑仍用于丝的加工。(10) 市政配套类(2处, 占比 2.5%): 用于满足乡村特定公共事务管理需求, 如王店圆筒粮仓被改造为微型消防工作站。

## (二) 问题诊断

分析以上再利用模式后可以发现, 杭嘉湖地区现有的 79 处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再利用项目整体呈现出以“他者”导向为主的实践倾向。多数项目强调文化展示、产业导入、经济转化等外向型功能, 服务对象以“他者”为主, 强调对外吸引力与产业激活能力。而基于“我者”的生活实践、社会交往与情感需求为出发点的再利用形态微乎其微。即便有少量可归入此类的公园景观类、图书馆类文化空间及部分保留原功能的遗产空间, 也多在实际运行中呈现出功能弱化、边缘化等问题, 难以真正建构具备“附近”特质的共处场域。

正如在调研中笔者所观察到的, 许多工业建筑遗产虽经改造利用, 却在功能与情感层面与村民产生了明显的隔阂。在调研中, 湖州妙西镇后沈埠村村民反映: “老房子仍旧在那里, 交通更方便了, 外观也更漂亮了, 可它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老房子’, 也不是我们生活中真正能用得上的空间了。”湖州织里镇义皋村村民在谈及老茧站时说道: “这里以前既是我们劳动生产的地方, 也是大家玩耍的地方, 现在变成了游客参观休息的景点。平时没有游客来, 基本门都不开的。”另有杭州临安区昌化镇居民表示: “以前有空就会到附近的厂区去散步小聚下, 现在偶尔去走下, 确实好看, 环境也好, 却找不到以前那种

熟悉的感觉了，虽然这么近，但是很少再去了。”这些反馈表明，改造后的工业建筑并未真正嵌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也难以唤起他们的认同感，反而成为游离于村庄生活之外的一种视觉陈设。

归根结底，现有再利用模式反映出的核心问题在于：遗产空间往往被视作形式上的展示容器或资本运营平台，而未能与当下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社会交往关系及情感结构建立实质性关联。这一根本性偏差直接导致了遗产空间的“形式化”“脱嵌化”与“去场所化”等现象的普遍发生。

### 1. “形式化”：遗产空间为谁服务

在多数再利用实践中，乡村工业建筑遗产被改造为博物馆、陈列馆、乡村客厅等场所，并被赋予展示、文创、体验等可消费性功能。此类空间的设计与运营，通常以游客、外来观众或政府主导的审美为导向，侧重于强化主题化叙事与视觉呈现，而非扎根于本村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与社会关系网络。

尽管遗产空间在物理层面实现了活化利用，却因缺乏与当地村民的深度联结，最终沦为“在场的远方”——其形式虽然被保留，内在情感与关系却被疏离。村民既对这些空间的用途缺乏认同，又难以理解其设计意图，故而无法在其中展开真实的日常实践与社会交往，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其作为“附近”关系节点的社会价值。

### 2. “脱嵌化”：社会关系的断裂

部分遗产空间尽管在物理上保留了与村民日常生活的邻接性，但在实际运营机制上却呈现出高度封闭与管理导向的特征，如设置高消费门槛、限定开放时间、采取预约准入制度，或由外部运营团队完全主导而缺乏村民参与。这种“制度性”排除使遗产空间对村民而言丧失了使用可能性与自然可达性，导致其在日常生活中被边缘化。

此类空间丧失了应有的开放性与共享性，因而难以支持“附近”概念所依赖的弱连接、

慢节奏的日常互动。社会关系的生成机制也随之萎缩，“共处”退化为“共看”。本应承担公共交往功能的遗产空间，最终异化为孤立的符号展示或外来资本的运作平台，彻底失去了其社会性根基。

### 3. “去场所化”：情感锚点与地方记忆的丧失

“去场所化”主要表现为在空间改造过程中，对原有的劳动痕迹、集体记忆、在地经验和生活语境缺乏系统性尊重与转译。许多再利用项目虽注重形式美学、功能置换与品牌包装，却未能有效保留或转化乡村工业建筑所承载的乡村工业历史、文化记忆与物质叙事。例如，湖州新市的“方有顺茶行”被改造为江南茶文化馆、后沈埠茧站则转型为湖州知青博物馆。这种与原有遗产功能及历史语境存在显著偏差的处理方式，既削弱了空间的“在地性”感知基础，也难以在情感层面引发共鸣。

此外，当前大多数设计与运营逻辑往往立足于“他者”的想象，而未能嵌入“我者”的感知结构、记忆框架与使用逻辑。情感锚点的缺失，使空间丧失了文化连续性与社会嵌合性，因此导致认同机制发生断裂，致使“附近”的关系结构难以在记忆层面得以重建。

“形式化”“脱嵌化”“去场所化”三重问题共同表明：当前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的再利用实践，存在着“附近”维度上的系统性缺失。其直接表现为空间功能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结构性脱节。这使得遗产空间日益游离于乡村生活世界之外，最终沦为了一种“在场的空壳”。

## 四、“附近”视角下的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再利用机制建构

通过对杭嘉湖地区已实现利用的79处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的归纳分析与问题诊断可见，当前实践普遍面临“形式化”“脱嵌化”与“去场所化”等结构性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现有利用路径未能有效回应空间的在地性基础、情感黏性与社会关系网络，致使空间虽实现功能活化，却难以达成社会、情感、空间的协同共建。在此背景下，本文针对该地区尚

未再利用的 160 余处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引入“附近”理念作为分析与实践框架，从空间性、情感性与社会性三个维度出发，探讨如何在遗产利用实践中嵌入“附近”意识，旨在重构一种兼具日常共处、关系联结与情境认同的再利用路径，从而为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的活化提供可持续的机制支撑。同时，这一理念的实践还可依托杭嘉湖地区的运河水系资源，使乡村工业建筑的活化利用融入全域旅游的整体框架<sup>[30]98-116</sup>，使其既能服务于“附近”，也能吸引“远方”来客。

正如相关研究者所指出的，建构我们的“附近”是乡村建设的首要任务<sup>[31]106-121</sup>。那么，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空间的利用究竟应服务于谁？是服务于来自“远方”的消费性“他者”，以满足其视觉体验与文化消费期待？是否顺应了“可视化”和“流量化”的政策诉求和绩效导向？抑或能够真正回应在地居民“我者”的生活实践？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再利用”的路径选择，更指向在“附近”方法下，空间应如何被合理组织、有效连接，并共同重构一种兼具公共性、情感性与认同性的空间逻辑。

### （一）再造空间结构：日常性场景的回归

“附近”的建设最重要的在于其“日常性”<sup>[5]1-9</sup>；有研究进一步指出，重建“附近”的关键节点，应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乐于看见或听见的人与事物中寻找，如此方能“对症下药”<sup>[14]60-72</sup>。这些思路启示我们，以“附近”作为方法，意味着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的空间延展出更多的日常性。为此需要将“附近”的方法视角与底层的现实关怀相结合<sup>[32]29-37</sup>，从而让遗产空间真正融入本地村民的日常生活。

因此，遗产空间的再造应从侧重于“功能复合”的技术逻辑向致力于“日常共处”的营造转变。这意味着，改造不能仅服务于“他者”眼中以观光体验为导向的“最后 500 米”式短暂停留，而更应植根于“我者”所处的“最初 500 米”<sup>[2]78-98</sup>的日常生活轨迹。具体而言，可引入的日常性功能空间可分为两类：一是对村民自发利用的“边缘空间”予以保留

与转化，以体现对原有生活方式的尊重。例如，将农产品晾晒区、农具杂物堆放角、节庆临时棚架等具有生活印记的微空间纳入设计。二是积极回应现代乡村生活需求，通过嵌入如老年活动区、快递驿站、便民服务站等新型服务功能节点，提升遗产空间的日常可达性与综合服务功能。只有将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空间重新嵌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网络中，激活其沉寂的空间场域，构建出可使用、可参与、可对话的“日常性”场所，才能真正实现具备“附近”特质的空间再造。这一过程旨在完成从孤立的遗产空间向融合的生活空间的根本性转化，从而真正体现“附近”视域所倡导的人文关怀与在地韧性。

## （二）重建情感场所：情感黏性的分类建构与空间嵌入

在乡村工业建筑这一类原生场所逐渐被闲置、形式化利用、脱嵌化处理的过程中，其作为村民情感寄托与集体记忆承载体的功能逐渐被削弱，甚至完全消失。尽管物理空间依然在场，却难以激发村民的情感共鸣与主体参与，这就导致情感的承接机制发生断裂；村民亦失去了一个可供记忆再现与情感交流的在地活动场所，从而陷入情感疏离与主体性退场的困境。作为构建“附近”的关键，重建熟悉的“附近”，实质上是一场情感机制的再激活过程——它不仅要求空间“在场”，更呼唤情感“在场”。基于此，本文将乡村工业建筑遗产中蕴含的情感划分为三个典型维度，并分别探讨其在场所中的嵌入路径。

一是怀旧性情感——对集体劳动记忆的时间性回望。这类情感源于村民对工厂生产中邻里协作、共同劳作、节庆共庆等集体经验的怀念，具有强烈的身份认同与历史纵深感。其空间嵌入应立足于“记忆转译”策略：通过系统性地采集村民口述史、整理老照片与生产工具、保留典型工业构件，并在空间中设置“记忆角”“旧物墙”或沉浸式复原某一生产场景，将抽象的记忆具象化为可感知的空间叙事，从而唤起“我者”的深层情感共鸣。

二是归属感与地方认同——对“我们的空间”的日常性确认。此类情感的建立并非单纯地依赖历史，更源于当下村民对空间的使用权、话语权与持续的情感依附。其空间嵌入的关

关键在于推行“参与式营造”：让村民在遗产再利用中成为共同的设计者、使用者与管理者。例如，将闲置厂房部分区域交由村民自主运营，或转化为老年茶室、儿童游戏角或节庆筹备空间等；同时，在空间标识、墙面彩绘、功能布局中，主动融入本地符号，以强化“这是我们的地方”的集体认知，从而有效重建村民情感归属。

三是共情性联结——与“他者”的微弱而真实的互动可能。“附近”的构建不应封闭于熟人社会，也需向外部开放情感通道。这类情感强调通过低门槛、高互动的公共性事件，促成村民与外来者（如游客、返乡青年、研学学生等）之间的情感交换。其嵌入方式包括：定期举办手工体验课、乡村工业主题讲座、邻里市集等参与性活动；设计开放式的观展动线与互动装置，引导“他者”从被动的观光者转变为积极的共情参与者，从而推动空间从“消费性场所”向“共情性场所”的根本转化。

情感黏性的重建并非单一维度的怀旧或美化，而是需要通过“分类识别—精准嵌入—多元互动”的路径，使遗产空间最终成为一个能够承载过去、扎根当下并连接他者的情感复合体。唯有如此，方能在“附近”视域下，真正完成从“空壳空间”到“有情场所”的转化。

### （三） 嵌入社会关系：经营过程中的角色重构与互惠机制

“附近”不仅是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生成机制。它强调日常生活中的互动性交集，是每一个社会主体得以安身立命的关系网络。真实的“附近”，具有强烈的社会性，是人与人之间基于共同生活经验与持续情感交换所构建的关系场。尤其在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再利用这一高度依赖外部资本投入的实践中，“附近”的重建无法回避经济利益分配与权力结构问题。

当前，多数再利用项目虽引入了村民、游客、投资方等多元主体，但往往形成了“资本主导、村民边缘、游客消费”的单向权力结构：投资方掌控经营权与收益分配，村民仅

作为劳动力或文化符号被有限吸纳，缺乏实质性参与和利益分享；游客则被简化为消费流量，难以与地方建立深层连接。此种模式虽可能实现短期经济收益，却割裂了遗产与本地社会网络的内在联结。因此，基于“附近”视角，遗产再利用亟须从单纯的空间更新转向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再嵌入，而其核心在于重构合作机制：一是明确村民的“在地权益主体”地位，使其超越“雇工”或“房东”角色。村民不仅是空间的原住民，更是地方性知识、乡村记忆、乡村网络的持有者与传承者。应通过股权合作、收益分成、合作社运营等方式，推动其从“被动受益者”向“共同经营者”的身份转变。二是引导投资方从“外部开发者”向“在地协作者”转型。投资方应主动嵌入本地社会与经济网络，具体可通过雇佣本地员工、采购本地服务、尊重村民既有的空间使用习惯等方式，并建立由村民代表参与常态化协商共治机制。三是将游客纳入“关系生产”而非“流量消费”链条。通过设计深度体验项目，如参与一日工坊、认养一片桑田等，使游客从观看者转变为在地行动者。游客在互动中得以理解地方特性，其消费行为也由此转化为对本地关系网络再生产的支持，从而间接巩固村民与投资方的可持续合作。

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的“附近”重建，本质上是一场社会关系的再协商与再组织。唯有在经营过程中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互惠机制，使村民真正成为遗产价值的共创者与共享者，使投资方转变为在地发展的协作者而非掠夺者，如此才能实现从空间占有到深层关系共建的根本性转变，使“附近”不仅可感知、可使用，更能持续维系。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附近”视域，构建了一个包含“日常嵌入—情感激活—关系共治”的乡村工业建筑遗产再利用机制。该机制以村民日常生活为起点，以情感认同为纽带，以多元主体互惠为保障，三者相互支撑，共同推动遗产空间从被观看的客体转化为可生活、可持续的关系场域。穿透当前遗产再利用中固有的功能主义与表征主义视角，是重新理解与建构“附近”的关键起点。“附近”不应仅被简化为地理上的临近，而应被理解为可被

感知、可参与、可交往的日常生活实践场域。作为一种观察社会空间和日常联结的分析方法，“附近”为解读乡村工业建筑遗产空间中的社会实践提供了新视角，也为突破传统“保护—展示”范式的局限性指明了方向，这正是项飙“重构附近”理念在遗产领域的实践延伸。

需指出的是，本文虽以杭嘉湖地区为例，具有较强的江南水乡工业建筑遗产代表性，但相关结论对于西部欠发达乡村或民族地区的适用性仍有待检验。此外，“附近”作为一种分析视角与方法论工具，在遗产再利用实践中的操作仍缺乏成熟的评估指标与标准化流程，未来需要在更广泛的乡村场景中持续探索，以真正实现从“理论附近”向“实践附近”的转化。

#### 参考文献：

- [1] 严飞. 以“附近”为方法：重识我们的世界[J]. 探索与争鸣, 2022(4).
- [2] 项飙, 张子约. 作为视域的“附近”[J]. 清华社会学评论, 2022(1).
- [3] 董山民, 赵英. “附近”的消失与再造：反思技术扩张时代的社会团结[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3).
- [4] XIANG B. The nearby: A scope of seeing[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2021(2&3).
- [5] 项飙, 康岚. “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人类学家项飙访谈（上）[J]. 当代青年研究, 2023(5).
- [6] 项飙. 人重新站在大地上：“附近”的保守和热情[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3).
- [7] 严飞, 黄思奕. 共鸣与互惠：重建“附近”的感官与关系路径[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3).
- [8] 严飞. 深描“真实的附近”：社会学视角下的非虚构写作[J]. 探索与争鸣, 2021(8).
- [9] 张京唐, 邓明磊, 殷旺来. “附近”的再生产：技术赋能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以杭州市L社区为例[J/OL]. 电子政务, 1-11[2025-11-26]. <https://link.cnki.net/urlid/11.5181.TP.20250429.1431.004>.
- [10] 焦宝, 胡奇茵, 江静洁. 重拾消失的附近：个体怀旧记忆的空间化：基于百度实景地图“时光机”的研究[J]. 新闻爱好者, 2025(6).
- [11] 黄骏, 陈雪薇. 消失的报刊亭：用户评论、数字怀旧与“记忆中的附近”[J]. 传媒观察, 2024(9).
- [12] 朱思敏. 何以重构附近：社区空间的审美化与日常化：基于成都两个社区的考察[J]. 城市发展研究, 2025(3).
- [13] 吕俊延, 甘甜, 叶岚. 重建“附近”：空间生产与共同体生成：以上海市G社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为例[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24(02).
- [14] 胡李阳, 于德山. 有声的“附近”：数字时代的社交空间建构与文化生产：一项基于青年音乐节的考察[J]. 传媒观察, 2025(5).
- [15] 孙丽丽, 沈婧. 生活在此处：基于“附近”视域的儿童哲学教育空间的重构[J]. 教育发展研究, 2025(2).
- [16] 李翠玲. 再造“附近”：邻里商铺与城市“地方”重构[J]. 新视野, 2025(1).
- [17] 马烨, 杜璇. 在“附近”建构“远方”：社交媒体平台中“假装在国外”打卡笔记的时空

- 叙事[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5).
- [18] 谭日辉, 李金娟, 张乃婧.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消费空间生产研究: 以北京首开 LONG 街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25(4).
- [19] 郑芳芳, 朱斌. 重建流动的“附近”: 基于结构化理论的骑游者自我认同建构研究[J]. 旅游学刊, 2025(5).
- [20] 薛岚, 张静儒, 韩佳妍. 重新发现附近: 惯常环境下的城市微旅行体验研究[J]. 旅游学刊, 2023(5).
- [21] 张翠娥, 黄经纬. 重建“附近”: 社会工作机构参与农村养老服务的在地化路径[J]. 浙江学刊, 2024(4).
- [22] 吴海琳, 曾坤宁. 激活“附近”视域下的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J]. 理论与改革, 2023(6).
- [23] 李锬, 莫创, 潘金龙. 乡村工业遗产价值评估与保护再利用: 以高淳蒋山轮窑为例[J]. 江苏建筑, 2015(6).
- [24] 赵彬, 王轶. 城市近郊乡村传统产业建筑“空间—产业”联动更新设计研究: 以湖南浏阳亚洲湖村老烤烟房改造设计为例[J]. 湖南包装, 2018(2).
- [25] 陈迪, 孔敬, 孙丽平. 乡土景观整合视角下的风雷仪表厂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J].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3).
- [26] 高梦雅, 田燕.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镇三线工业建筑遗产再利用研究: 以鄂西北地区三线军工村镇为例[J]. 华中建筑, 2023(2).
- [27] 方立明, 何崴, 陈龙. 山村烤烟房的艺术化重生: 都团村公共服务中心[J]. 设计, 2020(24).
- [28] 韩晗. 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公共阅读空间的构建路径研究: 以农村工业遗产改造更新为视角[J]. 出版广角, 2021(18).
- [29] 徐有威, 张胜. 小三线工业遗产开发与乡村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以安徽霍山为例[J]. 江西社会科学, 2020(11).
- [30] 刘佳妮, 邬佳妮. 基于文化遗产可达性的运河带全域旅游发展策略: 以江南运河浙江段为例[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24(11).
- [31] 刘拥华. “附近”的社会学及其经典根源[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3).
- [32] 王小章. “悬浮”与“附近”[J]. 读书, 2023(8).

## Research on the Utilization Path of Rural Industrial Architec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arby” ——Taking the Hangzhou-Jiaxing-Huzhou Region as an Example

ZHANG Pingfang

(School of Art,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the “nearby” originally rooted in local society has gradually declined. This phenomenon not only occurs in cities, but also spreads to rural society. This paper takes the concept of “nearby” proposed by anthropologist Xiang Biao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search method, selects the Hangzhou-Jiaxing-Huzhou reg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as a case, and focuses on the reuse path of rural industrial architectural heritag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urrently reused heritage space generally has the triple dilemma of “formalization”, “disembedding” and “de-placement”, and fails to respond to the daily connection and emotional needs between the heritage space and the local villagers. To this end, this paper reconstructs the reuse path of rural industrial architectural heritage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patiality, emotionality and sociality of “nearby”, aiming to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utilization paradigm that is oriented towards “others” and ignores “self”, and to construct a heritage utilization mechanism with daily scene return, emotional stickiness co-construction and re-embedding of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s,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al architectural heritage space.

**Key Words:** “nearby”; rural; industrial architectural heritage; utilization path; Hangzhou-Jiaxing-Huzhou area